

明末清初云南传统儒学的复兴与诗坛走向

董雪莲, 段 伟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明末清初时期, 面对社会的危机重重, 部分文人学者掀起了复兴传统儒学的浪潮, 以期通过振兴儒家正统思想来匡扶世道人心, 挽救国运。云南地处偏远, 步伐却并未滞后, 学术上体现了儒学复兴的鲜明倾向与实践精神, 诗歌创作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预示着新的走向。

关键词: 明末清初; 云南诗坛; 传统儒学; 诗歌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2) 05 - 0085 - 08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2. 05. 012

The Renaissance of Yunnan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and the Trend of Poetic Circle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DONG Xuelian, DUAN 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facing many social crises, some scholars set off a wave of reviving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hoping to help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save the nation by revitalizing the Confucian orthodox thought and the spirit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 Yunnan is located in a remote place, but its pace has not lagged behind, which academically reflects the bright tendency and practical spirit of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In this context, poetry creation shows a new look and indicates a new trend.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Yunnan poetic circl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poetry creation

明朝末期,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重和国运的日益艰难, 有识之士开始从学术根源进行反思, 寻找世道人心和社会风气隳颓的根由。在认定空谈心性的王学末流败坏了世道风气最终导致社稷危机的共识之下, 一部分文人开始转向“尊经复古”, 致力于振兴儒家正统思想, 呼吁回归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 主张砥砺德行、研磨学问, 以经世致用为旨归, 以此匡扶世道, 挽救国运。早一些的如以顾宪成、钱一本为首的一批东林名士, 稍晚的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颀、颜元等大儒, 他们很早期认识到学术空疏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在进行强烈批判和呼吁的同时, 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建“崇实黜虚, 修己治世”的传统儒学, 力图拯衰救弊。关于

这一点, 学界早有共识, 无须赘述。正如夏维忠所言: “他们最基本的就是道德济世, 即着眼于现实世界的困境, 重提学术思想上的道德传统, 重树道德伦理上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 在善恶、是非、君子与小人之间, 二元对立, 绝不含糊, 并进而依此标准, 来梳理现实世界, 挽救危机。”^[1]

云南虽然地处偏远, 但在这一时期风气的转移上并未滞后, 诸多学者和诗人也体现了复兴传统儒学的鲜明倾向, 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先行者和杰出的践行者。比如呈贡的文祖尧、姚安的高爵映、保山的王弘祚、通海的阚祯兆、蒙化的张端亮、浪穹的李崇阶、昆明的杨文林以及丁焜南昆仲、保山的戈允礼、太和的杨定国、鹤庆的孙桐,

收稿日期: 2022 - 07 - 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云南文学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21XZW015)。

作者简介: 董雪莲(1978—), 女, 云南大理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段伟(1996—), 男, 湖南衡阳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等等。这些学者文行并举，体现出了儒家的笃行精神和经世品格。如呈贡诗人文祖尧滞留娄东期间，在人才济济、硕儒辈出的江南太仓州讲授程朱理学，曾轰动一时，吴伟业、陈瑚、陆世仪、归庄等名士敬称其为“滇南先生”，奉为一代大儒；保山王弘祚精研儒家经典，“敏达宏硕，自诸生时即以经济为学”^[2]，顺治间主修朝廷《赋役全书》，奉为清朝赋役制度“一代程序”^[4]，其《滇南十义疏》《筹画滇疆五条疏》等，对饱受战乱的云南疗治疮痍、兴废举坠产生了积极影响；姚安县高裔映，身兼土司、学者、诗人、隐士、慈善家于一身，生平著述八十余种，“自性理、经济、玄释、医术莫不洞晓，诗词歌赋皆能深透入微……”^[3]通海诗人阚祯兆通经致用，负经世之学，“于国计盈绌、吏治臧否、民生利病靡不淹贯该洽”^[4]；蒙化诗人张锦蕴，学问渊瞻，值明末兵火之后书籍散亡，他“手纂《四书》讲义，以教后学”^[5]，泽被一方；鹤庆孙桐，不仅制义精悍，擅长诗古文词，同时“尤契伊、洛渊源理，……讲学授徒，弹琴乐志，益精性命之旨”^[5]，饶乙生“潜心性理之学”^[6]；宾川曾高捷“精求性命之学”^[5]，蒙化诗人张端亮“经济、学业殊绝”^[7]等，他们不仅能诗擅文，且精研性理，沉潜濂洛之学，并能通经致用、切中时务，普遍具有务实精神和经世之才。

一、以“滇南先生”文祖尧为代表的 滇南学者及儒学复兴

(一) 文祖尧

江南太仓州，自古钟灵毓秀，人才辈出，至明末更是彬彬济济、十步芳草，先后有复社巨子张溥、张采，文坛宗主王世贞、诗坛耆宿吴伟业、理学名儒陆世仪、陈瑚，丹青名家王时敏等，无不名重天下。但就在这样一个人文荟萃之地，一个来自滇南荒徼之区、选贡出身的微末下吏，在战乱之时滞留此地，竟得到当地硕儒名彦的推重，敬呼为“滇南先生”，相与从学。他返乡之际娄东名士数十人绘图作诗相赠，挥泪送别；闻其卒于归途，在其生前居室设立牌位，并命其室为“思贤庐”，私谥“贞道先生”，久为缅怀。他就是来自云南的文祖尧。

文祖尧（1589—1661年），字心传，号介石，晚号日月外史，云南呈贡人。文祖尧为天启辛酉年（1621年）选贡，任四川名山县训导，崇祯癸未年（1643年）晋江南太仓州学正。国变后他毁服弃官，遁迹苏州中峰寺，从云南高僧苍雪法师游，后寄迹太仓之昙阳庵，因兵阻不得归滇，滞留娄东十七年。为怀念故国，文祖尧取“日月外史”为号，以“日月”为“明”之意，终身不忘故国。顺治十八年（1661年）闻滇道通，决意返乡，八月至湖南桃源县，病中听闻永历帝已被困于缅甸，悲痛不食而卒，年七十三。

文祖尧虽然官位不显，但德粹学纯，操履严正，他很早就认识到了传统儒学衰落的危机并一直致力于起衰救弊：

儒学者，别异学、曲学也，异学则无裨于纲常伦纪，曲学则无当于天下国家。惟儒学则道在人伦、教垂经籍，上可整纲肃纪，下可易俗移风，其有关世道人心者甚巨。……迨至晚近，此学不明，不特官不能以约士，士亦不受官之约，悠忽者既坏于因循，旷达者或流于诞放，即矫然以豪隽自命，亦惟是采春华、忘秋实，奋精神于帖括，冀邀青紫，而经义彝伦之学未尝过而问焉。……无怪乎伦纪日颓，风俗日坏，天下岌岌，鲜宁宇也。^{[8][11]}

这段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指向阳明心学及其末流对学术和风气的败坏，但清醒地看到了儒学衰落导致的世道人心之隳颓。出于匡时济世之宏愿，文祖尧任四川名山训导和太仓学政期间，以传统儒学教习诸生，并刊进修日程，以德行问学、古道训士，自己亲身躬行为表率，“士习为之丕变”^[9]。滞留娄东期间，他多次受陈瑚、陆世仪、郁法等邀请于静观楼、尉迟庙等处讲学，在场的有归庄、陈瑚、陆世仪、王育、盛敬、郁法以及王时敏之子王抃、王摅等娄东名士，归庄曾记：“尝记十余年前，旧太仓学博士文介石先生虽已解任，犹寓其境内，二三君子迭为讲学之会，每推文博士为都讲，环坐竦听者尝数十百人。”^[10]据陆世仪《跋滇南文介石先生戊子讲义后》一文可知，文祖尧的讲学以程朱理学“诚”“恒”“敬”命题为要义，很明显是对阳明心学空谈心性弊端的反拨。晚明阳明后学的流弊，导致士子蔑视礼法而崇放达，儒家纲常伦理败

坏,文祖尧提倡依仁蹈义,以名节廉耻相尚,大力倡导忠孝节义,一意摒弃空疏虚浮、脱离实际的学风,要求士子居敬穷理,强调自身道德修养,讲求务实、主张笃行,陆世仪称他的启发“无一字一句不可反之身心,无一字一句不可勗之同志”^[11],归庄亦感叹其讲学:“称圣人之遗训,演先儒之眇旨,知人伦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灭,人欲之不可纵,能无惕然动于中乎!”^[12]在社稷倾覆、学术信仰迷失的时期,文祖尧的学术导向无疑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导向,对明末清初娄东传统儒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影响。吴伟业结识文祖尧后感叹:“娄之人不知师道二十年于兹矣,自先生至,教以君臣父子之礼,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董其怠惰,诫其凌谗,以期于有成,于是远近称为先生。”^[13]他将文祖尧与高僧苍雪并称,感叹滇南“神僧大儒却并出”^[14],对其敬爱有加。陆桴亭亦有诗称赞文祖尧的到来对东南学术的影响:“举世悲胥溺,中流幸有师。”称赞他的学术“万里微官犹正朔,一方绝学是宗风”^[11]。这些都足见文祖尧在儒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对娄东士子的启迪之功。

文祖尧死于桃源后次年,娄东诸子才得讯,他们相约至文祖尧生前寓居地县阳庵哭祭,悲痛万分。他死后三年,诸友仍然不能忘怀,改县阳庵为思贤庐,时时祭祀,并私谥文祖尧为“贞道先生。”郁法作诗颂曰:“教比程朱敦正学,文同屈宋抱遗忠。共扶大义矜高节,私谥名贤绍古风。萍藻春秋仰止地,自应百世瓣香同”(汪学金《娄东诗派》第十四卷)。

虽然文祖尧人生的最后十余年都在江南度过,但其对传统儒学复兴的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并非在江南才形成。相反在所任的名山县和太仓州,均以启迪一方而名重一时。以微末下吏而被目为大儒,足见当时在偏僻荒远的云南,士大夫们对晚明学术的反思和质疑并不比中原内地更晚。

(二) 高裔映

除文祖尧外,姚安高裔映也是这一时期云南传统儒学复兴的杰出代表。

高裔映(1647—1707年),字元廓,又字雪君,小字遐龄,别号问米居士,亦号结璘山叟,姚

安土知府,彝族,明末清初云南思想家、学者、文学家,生平著述八十余种,明末清初在云南当首推第一。高裔映著述涉及经史子集、易理注疏、释典医药、声韵训诂、舆地方志,堪称云南少数民族学者中的集大成者。现有存目的有《太极明辨》四卷、《增订〈新刻瞿塘先生易注〉》十五卷、《等音声位合汇(原题《重订马氏等音外集》)》《问愚录》《迪孙》《理学粹》《备翰》四卷、《理学西铭补述》等诸书,诗文词方面有《妙香国草》《结璘山草》《非非草》《笔余诗集》《绿山诗草》等,见诸地方志和公、私藏书目录。除去著书立说、接引后学之外,高裔映还关心民生利弊,对于当地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教育发展、移风易俗等方面多有贡献,体现了儒家卓越的笃行精神和经世品格。虽然他终身未走出西南,却以自己的淹通博识和经世之才成为南中一代大儒。清季云南学者由云龙评价高裔映:“凡经史子集,宋元以来先儒学说与夫诗、古文辞、佛藏、内典,皆能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主,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教正。故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3]

传统儒学的回归使诗人们关注现实、重视修身笃行和学养,这一时期的云南诗人,普遍体现出来返归程朱理学、重视经史、通经致用的倾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王弘祚

王弘祚(1603—1674年),字懋自,从小饱读诗书,对经世之学犹有浓厚兴趣,“敏达宏硕,自诸生时即以经济为学”,崇祯十五年(1642年)由蓟州知州迁户部郎中,督饷大同,入清后历官户部侍郎、户部、刑部、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任户部期间,主修《赋役全书》,“裁定赋役,一准万历年间法例,晚末苛细巧取,尽刘除之,以为一代程序”^[15],可以说对清初赋役制度的完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顺治十五年(1658年)他向朝廷上《滇南十义疏》,就“稽丁田、恤士绅、抚土司、宽新政、慎署员、开乡试”等善后诸事进言,提出兴利除弊、与民休息,对于当时战乱后的云南有安抚民心、疗治疮痍的作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再次上《筹画滇疆五条疏》,推

进了朝廷针对云南一系列新政的实施。

(四) 阚祯兆

阚祯兆(1641—1709年),少负经世之学,“于国计盈绌、吏治臧否、民生利病靡不淹贯该洽,烛照数计。”^[4]云贵总督范承勋、王继文、按察使许宏勋等器其才,数次礼聘,参与修纂《(康熙)云南通志》,“均徭平赋诸大政,多所筹划”^[4],此后自己又修《通海县志》,云贵总督范承勋亲自为之作序。

(五) 其他学者

此外,还有剑川白族诗人赵炳龙(1608—1697年),深谙韬略,明末追随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先为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出谋划策,后效力于南明朝廷,多所筹划,不仅写得一首好诗文,也是匡时济世、身体力行的杰出代表。

蒙化的张端亮(1645—1739年),后人称其“经济、学业殊绝”^[7],上文所提及的保山戈允礼等,也都是这一时期致力于程朱理学、笃行务实、通经致用的诗人代表。

二、儒学复兴下的云南诗坛

受传统儒学复兴的影响,这一时期云南诗人的诗歌创作体现出鲜明的儒家精神和内涵,篇中时时体现出传统儒士修身立德、抱节守志的倾向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担当精神,内容上以儒家忠孝节义、勇于担当、关怀现实的精神进行自我砥砺的倾向非常明显。

(一) 宣扬儒家安贫乐道、持节自守的品质

如文祖尧辞官后在江南曾一度生活窘迫,娄东人士对其甚为敬重,争相邀请他至家,以一饭为荣,但他坚持以青鸟术自给,处境清贫,陈瑚形容他的处境“吟残丹叶空留恨,读遍青鸟未疗饥”^[16],但他忧道不忧贫,全然不以自苦。他的集子中很难见到吐露自己流离困顿之苦,从不哀叹个人境遇,关心的都是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他作有《饭足窝》一诗,有句:“广文虽贫仕,素餐实可羞。谁云饭不足?我惧食犹浮。”^{[8]106}深恐自己的德行操守对不住一日三餐,他常常反思自己,“仕不足达道,

学不足穷理。德业方古人,不足与齐轨。事功对时贤,不足与媲美。风教不足培,流俗不足砥。”^{[8]106}他觉得自己事功、德业都有愧前贤,能吃饱饭已经心满意足,不应该奢求更多。他在诗中还时时以前贤的困厄来自比,以他们在困境中彰显出的德行操守来自我砥砺,他在《集陶》诗中写道:“闻有田子春,竟抱固穷节。荣叟老带索,袁安困积雪。邈哉此前修,栖迟诘为拙?常恐负所怀,量力守故辙。”^{[8]96}《在留别娄东诸友》中又以“疏水簞瓢安素履,蒲团竹杖托微权”^{[8]101}相砥砺,等等。诗中体现的素履以往、安贫乐道的可贵品质与情怀,正是传统儒家精神对士人的要求。

此外,文祖尧诗的另一个主题是以矢志孤忠、以身许国的古人为榜样,勉励自己忠于故国,坚守节义,如《挽节烈郭孺人》中有:“鲁连前在赵,不肯帝强嬴。胡铨后在宋,独赧作金臣。彼固天下士,烈行宜铮铮。”^{[8]96}在对忠君爱国的先贤进行褒扬的同时也是对自我的要求,同时也在批判明亡后士大夫节操尽失、“满朝朱紫尽降臣”(汪元量《水云集》)的现实。又如在唱和吴伟业赏菊诗中也有句:“不辞清冷甘孤立,为厌繁华懒斗妍。……无声泣露芳心苦,有意凌霜劲节全。”^{[8]103}通过赞扬菊花傲雪欺霜、不辞清冷、洁身自好的品质表露了自己在国运艰难中绝不改柯易节的志向。这种忠节自苦、没齿无怨,处忧患颠沛流离而不能屈其志,厄穷憔悴不能更其守,正是千百年来儒家倡导的大节。文祖尧晚年自号日月外史,取日、月为“明”之意,以示自己对明朝的忠贞与眷念,诗中也多次出现“日、月”字眼,抒写故国之思以及复国的坚定信心,如“头上尚悬双日月,眼中仍是旧山川”^{[8]102}“乾坤自觉非前阔,日月犹能再见无?”^{[8]101}“今时两地虽睽隔,日月依然共一天”^{[8]101}等句,无不是对故国的思念与振兴国运的殷殷期待。

他的诗歌朴素自然、不事镂刻、雕琢,凝聚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安贫乐道的品格,感情真挚深沉,意境深远,有沉郁厚重之风,加之浩然之气贯穿其中,自有一种风节凛凛的气概。

(二) 诗歌思想和内容方面体现了积极用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入世精神和责任感

传统儒学的复兴使学者、诗人们摆脱了空谈心

性的虚浮空泛,以立命担当的精神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如高僧担当在乱世中出家多年,依然深切关注时运,终身未曾放下匡时济世的抱负与理想:“匡扶运会,大丈夫皆有其责”^{[17]529},诸多的诗人们都以天下为己任,展现出奋发有为的精神追求:“丈夫生世间,天下为己任”^[18]、“男儿要当出有益,不然岂无山之阿”^{[19]71},体现出强烈的经世情怀,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和现实关怀成为主调,“苍生难未已,吾忍独谋身!”^{[20]65}“丈夫千古心,岂能谋石甌。”^{[19]71}他们不以个人荣辱得失为虑,时时不忘匡时济世的责任,纵然知道自己身份卑微,却当仁不让,“匡时经济传先略,千蛊艰勤待后贤”“尼父行藏吾岂敢,希文忧乐与谁归”^{[20]49}“丹履不随风雨易,定将广厦庇苍生。”^[21]战乱的时候他们敢于投笔从戎,挺枪跃马,为恢复国运九死不悔,复国无望后毅然担起文化遗产的使命,积极有所作为。因此,即便这一时期的诗歌虽有国仇家恨、故国之思以及壮志难酬的忧愤充溢其间,但总是于迷茫、悲哀中焕发出新的勇气,体现出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精神和昂扬不屈的气节,就如保山遗民诗人刘坊所言:“不为死生利害之所惑,至有触天地鬼神之忌,犯雷霆斧钺之怒,举世排之而不顾,赴汤蹈火而不疑。”^{[20]27}这种昂扬高举的悲壮,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正是传统儒士的风貌。在晚明衰颓的风气中,如同列缺霹雳,划破黑暗长空,震撼乾坤。

(三) 诗歌体现出留心经史、掌故的实用倾向,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价值

明末清初的云南诗人们在复兴传统儒学的过程中,普遍有留心经史、精通掌故、讲求笃行务实的倾向,诗歌中也有强烈的实用色彩和存史意识,如彝族诗人高翥映的《妙香国草》。

《妙香国草》为高翥映漫游大理期间所作。“妙香国”代指大理,大理素有“妙香国”之别称,至于这一说法的根源,历来聚讼纷纭,但都与大理佛教兴盛密切相关。明代谢肇淛在其所撰《滇略》中记载“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清代僧人释同揆在《苍洱丛谈》中亦言“大理府为天竺妙香国”^[22]。

《妙香国草》系高翥映在文学创作方面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著述,收录68首诗作,涉及大理名胜古迹数十处,如浩然阁、三塔寺、汝南王碑、阿育王塔、花甸、荡山、罗刹洞、观音市、上关花、盟神祠等,很多地方都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优美的传说,每首诗歌前面诗人都写有题释,解释、补充诗歌中不能囊括的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并阐发自己的思想,除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小品文外,作者本着求实存真的态度,对大理某些历史掌故提出质疑,纠正谬误,他自己也声明此集“上下古今,全其真、摘其谬,订古者十一,据今者二三,一勺等于沧海,一撮重于泰山。……不徒作文字观而已。”^{[23]30-31}在凡例中又言:“史有正情,必生观感。适阅榆志,不合作史本旨,或一二诞谬荒浮,难为传信。此虽小品也,核实纠论,实存深意。……盖搜古以思风会之从来,以见物情之正伪,不徒作游览观耳。此正所谓怀滇苦心,也不然,则游戏笔墨,可无作矣。”^{[23]44}这些说明,体现了作者创作时追求还原历史、求真务实的初衷。集中多处如《水滨神石》纠正李元阳《大理府志》谬误,《罢谷》指出史书之谬误,等等。因此,《妙香国草》虽然是一部诗集,但除了文学价值,还有史地学价值,堪称大理山水志和风物名胜志,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黄裳曾说:“《妙香国草》是时代较早、网罗较备的主要地方风物志。”^[24]

除了实用色彩,诗人们还体现出“以诗存史”的意识和追求,如蒙化遗民诗人陈佐才写下很多悼念明朝忠臣的诗,诸如《哭黔国公沐天波》《阅〈编录〉哭沐黔国》《听说小传再哭沐黔国父子》《吊窦将军名望、王将军玺死战》《吊元江世守那公》《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等,申明自己写下这些诗的目的之一是:“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25]体现了对诗歌历史价值的重视以及以诗补史、以诗证史的积极努力和追求,使诗歌完全扬弃个人化、主观化的幽情单绪,而紧密联系现实,不仅体现了一种自觉的社会担当精神,也是儒家重视诗歌社会功用的要求。

(四) 充满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与批判

明末清初以传统儒学为根底的云南士子们以淑世的情怀密切地关注着现实,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

还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批判意识,无论是易代之际对国运的深切担忧,还是乱后方平对百姓生计的深深同情,都显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担当、苍雪、陈佐才、赵炳龙、何蔚文等都写有很多关注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如《苦寒行》《孤儿行》《自鬻歌》《鬻女行》《鹤庆苦雨》等。《苦寒行》通过写贫家男主人“业农工力食,田瘠无种粮。赁逋养牲畜,夜为虎狼伤。官租难自办,迫走天一方。”^{[17]536}他不得已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备尝艰辛,连思念亲人也不敢回,处境何其凄苦!《鬻女行》则描写一个在战争中痛失三子的年迈老妇,迫于生计,不得已卖掉自己的女儿:

君不见,不早不涝民失所,野哭无人不痛楚。十日无食家无黍,老妇伶仃来鬻女。从来母性惟女知,问妇何不卖男儿?妇云有男三四个,里中征兵骨肉离。每一荷戈即不还,个个抛尸在军前。老朽失养将垂亡,谓女还值几文钱。鬻了去买升合米,今日且把性命延。^{[17]533}

两首诗都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悲苦境遇,将走投无路的下层民众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战乱、苛政带给人民的痛苦以及百姓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挣扎的现实,让人痛感“枯肠也断铁心酸”,发出了“天行时令固有主,须念泪雨如血淋”(《鹤庆苦雨》)的呼吁。语言之朴实,宛如直从百姓口中出。

浪穹诗人李崇阶写下了无数反映现实、抨击时政、关怀民生,如《催科》《清烟》《忧旱》《喜雨》《城中虎》《牧牛行》《计册》《蜀疆》《釜水即事》等。他鞭挞腐败,揭露黑暗,强烈批判和抨击那些身在权位,却只图中饱私囊、置民生于不顾的贪官污吏,“今之达权人,嗜欲如溪谷。但图一己饱,哪闻一路哭。”^{[26]375}面对民力衰竭、满目疮痍的社会现状,屈居下僚的诗人无能为力,心中异常痛苦,“政拙头先白,鱼劳尾尽红。”(《催科》)“忧时颇奈无奇策,忍见溪鱼变尽鲂。”(《釜水即事》),有时耳闻目睹百姓疾苦,他涕下沾襟,“余也闻斯言,泣下不能止。民之失其所,为司牧者耻。”(《青烟》),他只能以自己手中纸笔,宣泄心中的愤懑,同时寄希望于朝廷体恤民情,多下达一些有利民生的政策,“愿邀宽大诏,为我慰民穷。”^{[26]372}他的很多诗针砭现实,反映了清初民生状况,体现了清初诗歌强烈的现实关怀,战时百姓苦于兵火,

太平盛世又苦于盘剥压榨,诗人为他们悲惨的命运鸣不平,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对于他们的处境深深悲悯,但他挣扎于微末下吏的阶层,时时因自己无能为力而深感无奈与悲哀,这种感情纠结在一起,使他的诗歌中的感情动人心弦、感人肺腑。除了为人事忧愤,诗人也为时天灾而揪心,当久雨不晴,他彻夜难眠,写下“夜雨千家泪,秋田四野芜……”^{[26]372}当久旱不雨时,他又心煎如焚,“农人望云云不起,地肺炎生石骨紫。相谓青青陇畔秧,半学霜草枯黄死。”面对大旱,他忍不住痛呼“凭谁为我鞭火龙,卷起长江千尺水!”^{[26]362}当久旱逢雨之时,他比百姓还兴奋:“余心更比农家慰,好把堂名志喜亭。”^{[26]362}

呈贡诗人文化远有《苦雨触怀有述》《虎牛斗》《云南杂诗十二首》《喜雨》《雨足至喜》《辛酉秋尽抒事八首》《己巳秋兴八首》等诗,都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强烈关怀。

《流民行》是战乱方平后云南民生的真实写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战乱时百姓四处逃难,背井离乡,战乱后返乡同样遭受种种盘剥,有家难归,读来催人泪下:

……弱者尽属强梁吞,富家枉送崔符断。十全或二三,山谷夜相唤。悲声惨切不堪闻,闻之惻怛生长叹。长叹曾几时,戎马遍地驰。打粮济军实,劫掠首蛾眉。马牛与羊豕,一见扫无遗。……北门锁钥乡勇执,得钱者生何横行。蹇驴疲犊塞城府,权官点阅如审丁。驴三牛五须上值,不然摆踏役王程。豪衿废绅焰冲汉,勾连胥吏剥愚氓。……自春历夏不得归,和盆已滴胸前泪。耐可从秋又复冬,依旧故乡无净地。疫疠死有三,饥寒死有七。斗米如今过二金,多时簪珥衣裳毕。人人共恨不得归,只恐归时十无一。^[27]

此诗以惨痛的笔触描绘了百姓们在战乱中家破人亡、饥寒流离的场景,即便好不容易幸存下来,也不一定能回得了家,因为进城需要交钱;即便回了家,也不一定能继续生存,因为家中已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要受到官府的各种刁难和盘剥,敲骨吸髓,直至榨尽血汗甚至生命,血淋淋的现实让人不寒而栗。

保山诗人徐崇岳的《六凉歌》描写战后荒凉

的六凉城, 对战争残酷、无道的批判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少年曾骑六凉骢, 头高八尺气如龙。今日始经六凉地, 连天春草马群空。……二十年来逢丧乱, 云屯大马如烟散。……君看此日六凉城, 昔年万家如列营。高楼大屋连甍起, 深夜犹闻歌管声。乱历瘼矣遭驱掠, 良家大半填沟壑。断井颓垣不复知, 高田一望无耕凿。^[28]

诗中的六凉即现在云南省陆良县, 诗人以其真实而深刻的内容和高度概括的手法, 通过叙述曾经盛产骏马、繁华一时的六凉经战乱后变为空城的现实, 对战争造成民间严重的破坏和民生摧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此诗气韵沉酣、笔势驰骤和腕力矫健, 对战争的控诉与批判力透纸背。

徐崇岳另外有些非常有价值的诗作是大胆直露地揭示社会矛盾和黑暗现象的, 如《门有车马客》借过客之口, 揭露了贪官污吏与高利贷者狼狈为奸, 压榨百姓的现实:

……高官与放债, 此是取富资。大官噬下吏, 千金徒渺而; 下官敲穷民, 吮吸尽其脂。放债取十利, 过手即穷追。叠算鬻妻子, 遑恤哭与啼。贪吏无债客, 捶楚得亦迟。债客无贪吏, 不得穷榜笞。所以斯二者, 表里互扶持。结交尚气焰, 兄弟甘如饴。^{[19]63}

官吏与债客相互勾结, 唯利是图, 盘剥百姓, 根本不顾下层人民的死活, 其贪得无厌而又凶残丑恶的嘴脸在诗人笔下刻画得无比形象。

(五) 倡导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

明末清初的诗人正处于社会激烈动荡的时期, 诗中感情忧愤深广, 但尽管如此, 受传统儒学的影响, 普遍有回归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倾向, 如一腔孤忠的担当尽管诗中时时有风云之气, 但诗歌创作却不离温厚之旨: “余慨近代诗人, 饶工近体, 薄古体, 一概置之不问, 专以尖新隐僻、佶屈聱牙靡然相尚, 藐何、李为旧物, 耻七子为叫号, 致使世运随之而转, 及究气温厚之旨, 谁不茫然? 悲夫! 尚敢忘其鼓吹休明、挽回世运哉!”^{[17]537} 陈继儒评他的诗“调激而不叫号, 思苦而不呻吟, 大雅正始而不入于鬼诗、童谣、俚语、方言之俳陋。”^{[17]527} 董其昌也言其诗“温淳典雅, 不必赋帝

京而有四杰之藻, 不必赋前后出塞而有少陵之法”^{[17]528}, 都已看到了他诗歌创作尊崇儒家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倾向。他在追求温柔敦厚的同时, 始终强调儒家的道德和学识修养: “明季作家, 大率重才轻养, 犹学仙者, 知有还丹而不言火候, 自误误人非小, 可不慎哉!”^{[17]529} 砥砺德行、重视学养的倾向已经显现。同时期的苍雪主张诗歌创作中的“浩气”, 也是对孟子和韩愈养气说的阐发: “爽籁发童谣, 浩气流元始。弦管被叶和, 参赞造化理。易水风萧萧, 壮士发上指, 禾黍离离兮, 横涕莫能止。”^[29] 赵士麟以孔子诗教为旨归, 重视诗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 他有《诗论》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阐述:

岂知诗上明三纲, 下达五常, 太极阴阳之化物, 则民秉之懿。……汉魏以来古意削矣! 人纲人纪, 随其所居之位各有当尽之道, 无所逃也。人人秉烛夜游, 世教谁与维持乎? ……夫君子之言, 贵夫有本, 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 斯足贵矣。……惟夫笃志之士, 不系乎世之污隆、俗之盛衰, 独能学古之道, 使仁义礼智备于躬出, 其辞能近于古, 外感乎物, 内发乎情, 情至而行乎言, 言形而比于声, 声成而诗生焉。^[30]

赵士麟为友人作诗序曾写道: “必有颖悟绝特之资而济以赅博宏伟之学, 察乎古今天人之变, 而通其洪纤动植之情, 然后足以奔驱百家而驰骤千里, 功加矣, 又必具温厚和平之养、庄严凝重之度然后其音淳庞而雍容, 铿锵而铿锵, 亢戾消则气象从容, 弃鄙去斯尊严典雅矣。”^[31] 这与他自己的诗歌风格也是完全一致的。

三、传统儒学复兴对云南诗歌的后世影响

北宋欧阳修曾感叹: “今之学者, 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 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 皆可悲也。”^[32] 批判了在一定时期内儒者们埋首经籍, 不通世故和不务实不笃行的治学态度。晚明时期阳明后学张扬主体精神、关注个人心性的弊端造成空谈浮薄的风气, 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面对社稷倾覆的危机与教训, 云南诗人与中原内地诗人同步地对学术进行了反思, 并身体力行进行风气的改造, 事实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传统儒学回归的思潮影

响之下,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学习圣人之道,并付诸实践,躬行务实,体现出了强烈的用世精神和责任担当,关怀现实、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云南地域学术的特征,与全国保持了一致的步调。

明末清初云南以传统儒学为依托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除褒扬和践行儒家尚节义、鄙荣利,重道德、崇礼法等传统伦理道德和匡时济世的责任感、使命感外,还对现实充满强烈关怀,仁民爱物的儒者情怀借诗歌的表现力深入人心,追求情感的真实、充沛,不作空疏之语,格调高昂,风格刚健。在学术和艺术皆回归传统、齐头并进的潮流下,儒家传统诗教在这一时期也得以在云南诗坛重新崛起,并形成清代云南诗歌本乎学问、以儒家诗教为旨归的发展主线,只不过这一步是入清以后才真正完成的。

[参考文献]

- [1] 夏维中. 关于东林党的几点思考 [J]. 南京大学学报, 1997 (2): 162-170.
- [2] 钱仪吉. 碑传集: 卷 10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3] 霍士廉, 由云龙. 姚安县志: 卷 27 [M]. 铅印本. 楚雄: 姚安县政府, 1948.
- [4]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府志辑: 第 7 辑 [M] // (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 卷 233.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5] 鄂尔泰, 靖道谟. (乾隆) 云南通志: 卷 21 [M]. 影印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6]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府志辑: 第 7 辑 [M] // (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 卷 196.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7] 张端亮. 抚松吟集 [M] // 丛书集成续编: 174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359.
- [8] 文祖尧. 明阳山房遗诗 [M] //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05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8.
- [9] 陈田. 明诗纪事·辛签: 卷 16 [A]. 天津: 天津图书馆藏.
- [10] 归庄. 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 [M] // 归玄恭遗著. 上海: 中华书局, 1923.
- [11] 陆世仪. 桴亭先生诗文集·文集: 卷 6 [A]. 天津: 天津图书馆藏.
- [12] 归庄. 静观楼讲义序 [M] // 归玄恭遗著. 上海: 中华书局, 1923.
- [13] 吴伟业. 梅村家藏稿: 卷 36 [M]. 《四部丛刊》景清宣统武进董氏本.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
- [14] 吴伟业. 梅村家藏稿: 卷 10 [M]. 《四部丛刊》景清宣统武进董氏本. 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9.
- [15] 赵尔巽. 清史稿: 卷 26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6] 陈瑚. 确庵文稿 [A]. 北京: 国家图书馆藏.
- [17] 担当. 担当遗诗 [M] //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72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 [18] 文化远. 晚春堂诗: 卷 1 [M] //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05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137.
- [19] 李根源. 永昌府文征: 卷 11 [A]. 石印本.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藏.
- [20] 刘坊. 天潮阁集 [M]. 龙岩: 政协福建省上杭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 1988.
- [21] 阚祯兆. 大渔集诗草: 卷 1 [A].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藏.
- [22]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府志辑: 第 7 辑 [M] // (民国) 新纂云南通志: 卷 110.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23] 高翥映. 妙香国草 [A].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藏.
- [24] 黄裳. 西南访书记 [J]. 读书, 1981 (11): 119-126.
- [25] 陈佐才. 重刊明遗老陈翼叔老先生诗全集 [A] 排印本.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藏.
- [26] 李崇阶. 釜水吟: 卷 2 [M] //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25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 [27] 文化远. 晚春堂诗: 卷 2 [M] // 丛书集成续编: 第 105 册. 台北: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140-141.
- [28] 袁文典, 袁文揆. 滇南诗略: 卷 17 [M] // 丛书集成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 1988: 281.
- [29] 苍雪. 苍雪大师南来堂集: 补编卷 1 [M] // 云南丛书.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30] 赵士麟. 读书堂彩衣全集: 卷 8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15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10.
- [31] 赵士麟. 读书堂彩衣全集: 卷 14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115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324.
- [32]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